

萧净宇 著

超越语言学

——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萧净宇 著

超越语言学

——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萧净宇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6652 - 6

I. 超... II. 萧... III. 巴赫金(1895 ~ 1975) — 语文哲学 — 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889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纭

封面装帧 王小阳

超越语言学

——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

萧净宇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82,000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6652 - 6/B · 554

定价 20.00 元

序

《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一书的作者萧净宇曾经是我的进修生(2003年9月至2004年3月)。她在研究米·米·巴赫金(1895—1975)这位对20世纪世界人文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俄罗斯思想家、美学家和语文学家的思想遗产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萧净宇曾多次造访图书馆,聆听各种与她的学术兴趣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课程,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讨论,她所撰写的几篇文章,先后发表在《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版)》*上。

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对巴赫金著作的出版,也由于国际性刊物《对话·时空体·狂欢》(维捷布斯克—莫斯科)和学术界对巴赫金研究的浓烈兴趣的推动,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积极的研究。

人们在研究巴赫金的学术遗产时,往往把它和新康德主义、诠释学、文化学、巴赫金思想的核心范畴——“行为”哲学、

* 指发表在《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版)》2004年第5期的“Философское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теории ‘речи’ М. М. Бахтина”(关于巴赫金“言语”理论的哲学思考)和发表在《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版)》2006年第1期的“Эстетика смеха М. М. Бахтина и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мех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巴赫金笑的美学和中国民间笑文化)两篇论文。——本书作者注。

“在场”哲学以及联结独一无二的“我”与文化统一性的“参与性”思维联系起来。人们对诸如欧洲小说中的作者相对于主人公的“外位性”和复调小说中主人公的“诘问—应答”、争鸣等美学思想已著述甚多，也写了一些关于具有节庆的、包罗万象的和双重性的狂欢文化的著作，以及一些关于囊括文学、戏剧、造型艺术和从总体上反映文化发展某些阶段的所谓狂欢化原则的论著。人们也谈到了巴赫金诠释中诸多净化问题的特点，如自我安慰、多愁善感、完成生存事件的原则、美学之爱、愉快的无畏精神、严肃的悲剧式英勇、果戈理创作中鄙俗成分的净化。

但是，今天研究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文献仍寥若晨星，而且，它们往往缺乏系统化和概括性，没有对巴赫金思想与其前人和当代学者的一些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而萧净宇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因此，萧净宇的这本书被确切地冠以《超越语言学》之名，无疑是恰当的。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与狭义语言学的句子和词汇观不同，它把句子和词汇放入与言语主体及其受话人的紧密联系中、放入主体与主体间的动态中加以考察，完全切合《超越语言学》的题意。在巴赫金那里，一直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对作者与主人公言语表述之间浅短的或者长远的距离和所谓的“混合”、“仿格体”、“讽刺性摹拟体”的方法的考察。

本书作者正确地论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在巴赫金看来，人的存在和生存永远是一种交往和一种既表现为外部的、亦贯穿于内部的对话，它甚至从来不会因“他人”之死而被打断。作者还令人信服地指出，对于巴赫金来说，作为独立个体的“他人”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在交往中，“他人”不仅与赞同有关，亦与反对（但却不是武断的）有关；不仅与理解有关，亦与不理解（但却

不是断然的)有关。如果说对于伽达默尔来说,重要的是说了“什么”,那么,对巴赫金这位俄罗斯思想家而言,重点强调的则是“谁在说”和“谁”在对话。

国立莫斯科大学

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叶·瓦·沃柯娃*

2006年4月19日于莫斯科

* 沃柯娃,女(1926—),哲学博士、语文学副博士,莫斯科大学功勋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著名巴赫金研究专家;现任教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艺术理论部;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曾在《哲学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版)》等多种俄罗斯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并著有《米·米·巴赫金的美学》(1990)和《艺术与美学之遇》(2005)等8部专著。此序的俄文原文见附录一。——本书作者注。

引 言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 1895—1975),一个独具魅力而为世人所日益熟悉的名字,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人文学界关注的中心。这并不偶然。事实是,米·米·巴赫金作为俄罗斯苏联时期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思想家,在语言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卓有建树,深具影响力。自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发现以后,他作为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的价值日益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同,到20世纪末已被誉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1]。作为一位多面学者,巴赫金兴趣广泛,著作繁多。其著作多撰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其中部分于20年代以友人之名问世,或以与友人合著的形式发表。但因斯大林集权统治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巴赫金惨遭政治封杀、被捕和流放。所以,几十年来,他的著作大多被束之高阁,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他的两部学术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65)的相继出版,“他的

[1]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名字才仿佛从虚无中又重新浮现了出来。”^[1]自此,他的影响和声誉才逐渐确立起来。

巴赫金思想为世人所瞩目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身为俄罗斯思想家,他的走红却是从西方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末,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最先由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В. В. Кожин)发现和整理出来,但很快,法国学者朱莉亚·克利丝蒂娃(J. Kristiva)就将它介绍到西方学术中心巴黎^[2],使法国学术界第一次知道了巴赫金的名字。之后,她又陆续评论巴赫金的两部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并促成它们于1968年至1970年间被译成法文与英文出版。自此,巴赫金开始被视为俄罗斯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超越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到了20世纪80年代,“巴赫金热”的中心渐渐移向美国,其声势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巴黎。1984年,美国学者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Katerina Clark and Michael Holquist)出版了专著《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是一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巴赫金研究专著。随后,巴赫金研究开展得轰轰烈烈,在国际上已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巴赫金学。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研究巴赫金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随着俄罗斯学者对巴赫金手稿的逐步整

[1] 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张杰、万海松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2页。

[2] 朱莉亚·克利丝蒂娃对巴赫金的介绍最初是在1965年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当时的发言题为《巴赫金与小说词语》,后经过整理,以《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为题发表在1967年4月的《批评》杂志上。

理和出版,西方学术界率先推出了一大批巴赫金研究专著,英文版的在中国国内就能找到近四十种。其中有些已被译成中文,如兹·托多罗夫的《批评的批评》和《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克·汤姆逊的《巴赫金的对话诗学》、格·佩奇的《巴赫金: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伯纳德·唐纳尔斯的《巴赫金: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托尼·贝内特的《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等。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学者托多罗夫于1981年发表的专著《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和美国学者凯瑞尔·爱默生发表于1997年的《巴赫金的第一个百年》。前者集中阐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其他一些学术概念;后者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巴赫金研究的状况并以较大篇幅、从哲学角度探讨了巴赫金的学术遗产,并以多维视角诠释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

由此,巴赫金的论著日益被学术界视为经典,而他提出的许多概念也已被一些权威词典作为专门术语加以收录,在人文科学的许多书籍中辟有专章介绍其思想。不少国家成立了巴赫金研究中心并定期举行国际性的巴赫金学研究活动,不少高校专门开设了巴赫金研究的课程,不少学术网站制作了专门研究巴赫金的网页。譬如,英国的舍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成立了巴赫金研究中心,制作了“巴赫金中心”的网页并创办了电子杂志《对话》;白俄罗斯则定期出版了巴赫金研究专刊《对话·时空体·狂欢》,并成立了“国际巴赫金学研究协会”,每两年还举行一次“巴赫金学术国际研讨会”。迄今,在耶路撒冷、曼彻斯特、莫斯科、纽约等地已举办过九届两年一度的“巴赫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诠释巴赫金时,西方学者尽管致力于剖析巴赫金的“对话”、“狂欢化”等概念,但他们往往习惯于从考察巴赫金与新康

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和宗教(基督教和东正教)的关系入手。他们视野开阔,构思奇特,但却往往沦于主观色彩过重的泥潭而未能把握原生态的巴赫金思想。

我国的巴赫金研究工作尽管姗姗来迟,但近十年来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不仅把巴赫金看作一名文艺理论批评家,更把他视为一位倡导对话主义哲学的思想家。这一时期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涉及有关其理论的各个方面,并致力于总体把握巴赫金的思想脉络。1993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题为“巴赫金研究: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会议,1998年5月又在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我国首届“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并举行了中文版《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的发行仪式。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巴赫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2004年6月,在湖南湘潭举行了我国第二届“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来自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四十多位巴赫金学著名专家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言,畅谈了各自的独到见解。据初步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论及巴赫金的论文仅有二十余篇,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文已有近二百篇,而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增至三百余篇;出版的关于巴赫金的专著也已有将近十部之多。

在俄罗斯语言学界和哲学界,90年代以前一直不承认巴赫金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不仅没有论述他的语言哲学的专著,甚至连作为权威辞书的《苏联百科辞典》(1980年版)对他的哲学思想也未作片言只语的评述,只是到了1995年版的《苏联哲学家辞典》和2001年新版的《哲学新百科全书》中才有所论及。近十年来,俄罗斯本土对巴赫金的研究有后来居上之势,某些方面在深度上已超越了国外的研究。

可以说,各国的巴赫金研究者,无论是文艺学、哲学、语言学的、还是文化学、人类学、甚至是心理学、传播学的,在纷纷从各自领域的角度论述巴赫金的同时,也都或多或少地能从巴赫金的论著中得到一些启迪。的确,巴赫金思想在 20 世纪后期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巴赫金如此受到世界学界的青睐,除了因为他深刻的学术造诣,其历经曲折的一生和逆境中坚持独立人格的高尚情操也是重要原因。

巴赫金 1895 年 11 月 16 日(新历)出生在莫斯科南部奥廖尔市的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他天资聪慧,自幼学习法语、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十二三岁时就已经阅读了德文原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1913 年,巴赫金进入新俄罗斯大学(Новоросси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即现今的奥德萨大学)学习,但次年就转学至彼得格勒^[2]大学,直到 1918 年毕业。^[3]四年的大学生涯使他有认识了罗扎诺夫(В. В. Розанов)、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韦坚斯基(А. И. Введенский)、洛斯基(Н. О. Лоский)等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宗教哲学家,并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

1918 年至 1924 年间,巴赫金先后经历了在涅维尔(1918—1920)和在维捷布斯克(1920—1924)两个时期。在涅维尔时期,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2] 彼得格勒的地名曾多次变更,1914—1924 年称彼得格勒,1914 年之前称彼得堡,1924 年后称列宁格勒,1991 年又恢复原名,称圣彼得堡。

[3] 孔金、孔金娜在他们的专著《巴赫金传》中写道:“在个人简历里,巴赫金提到,就在 1918 年春天,他大学毕业。但是,他究竟以何种形式完成大学教育的,很遗憾,我们还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没有参加当时规定的大学毕业预考,因而按学校规章制度他就没有取得彼得格勒大学的毕业证书。”

他在一所中学任教的同时,遇见并结交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天才人物,如沃洛希洛夫(В. Н. Волошинов)、蓬皮扬斯基(Л. В. Пумпянский)、祖巴金(Б. М. Зубакин)和卡甘(М. С. Каган)。他们和他一样,都热衷于探讨深层的哲学问题。巴赫金和他们一起成立了“康德研讨小组”,并成为小组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由于这一时期的巴赫金在学术上的出色成就,他被推举为该市其他一些学习小组,如古典哲学学习小组、欧洲宗教文化学习小组的领导人。而在维捷布斯克时期,巴赫金在该市的国立师范学院教书的同时,也像在涅维尔时一样,在其周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圈子,其成员们一有余暇就研讨哲学、艺术等问题。进入这个圈子的主要有巴赫金的友人沃洛希洛夫、麦德韦杰夫(П. Н. Медведев)等当地知识界名人。巴赫金在涅维尔和维捷布斯克生活和工作的岁月在其学术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1919年,巴赫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艺术与责任》,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艺术、生活与责任的关系,他认为,必须克服艺术、科学与生活之间相互隔离、互不负责的状况,并由此确定了“个人应当全面地承担起责任”的伦理观。^[1]1921年至1924年间巴赫金先后撰写了《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论行为哲学》等著作。^[2]1924年5月后,巴赫金回到彼得堡(当时已更名为列宁格勒)。在这里,巴赫金继续写作他在维捷布斯克时就开始创作的《论行为哲学》。

巴赫金在大学里主修语文学,有相当出色的语言知识,故他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切入对哲学的研究是不足为奇的。但他的一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495—497页。

生十分坎坷,童年时就患了严重的骨髓炎,成年后并未痊愈。尽管他以坚强的毅力读完了大学,谋得教师职位,并积极参与各学术团体的活动,勤于笔耕,但在 60 年代以前,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的著作大多不得不戴上“面具”,以他人的名字发表,譬如《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1927)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1929)是借沃洛希洛夫之名发表,而《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是借麦德韦杰夫之名发表。^[1]至于为何要借他人之名发表,他曾说过,这些著作是在“共同”的语言和言语作品观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是朋友。我们一起讨论。但他们有工作,而我有写作时间。”^[2]“在出版物上面使用自己的名字,我想这不是时候。”^[3]

美国巴赫金学专家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则认为:“以他在苏维埃知识生活中的微末地位,在那些年月里,巴赫金用自己的名字怎么可能发表如此之多的专著和文章——那时的政治形势对于他那一类的知识分子来说正日益恶化。如果他真这样做成了,那才是一桩奇迹呢,尤其是关于这样的论题,如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4]而且,麦德韦杰夫在经济上帮助过巴赫金,^[5]沃洛希洛夫则在巴赫金找工作

[1]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0 页。

[2] E. B. 帕斯捷尔纳克和 E. И. 帕斯捷尔纳克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作家通信》写的序言,载《文学遗产》,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3 卷,第 707 页。

[3] Бочаров С. Г., Об одном разговоре и вокруг него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3 г., №2, С. 73.

[4]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第 203 页。

[5]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4 页。

方面帮了大忙^[1]。所以,巴赫金借用麦德维杰夫和沃洛希洛夫之名发表专著的原因很可能是,一方面,由于麦德维杰夫和沃洛希洛夫在当时都有很体面的工作和地位:前者在维捷布斯克的省执委会担任要职,后者在省政治教育机关供职,任维捷布斯克省人民教育局艺术科副科长,^[2]以他们的名义发表这类带有当时主导意识形态气息的作品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巴赫金本人意图以此方式报答二位友人。总之,原因是复杂的,但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可看出巴赫金的无奈。对于巴赫金的著作权问题,美国的白银出版社在1982年再版的俄文本《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出版说明”中,根据上述基本事实宣称,“出版社不照顾任何人的威望或优先权,认为现在有足够数量的事实证明《弗洛伊德主义》、《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是巴赫金一个人。充其量,麦德维杰夫和沃洛希洛夫可能参加了编辑工作。”

1928年底,就在巴赫金以自己的名字署名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第一版发表前不久,巴赫金遭到了逮捕,原因是他在大学中讲授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康德哲学和一些宗教小组的牵连。随后,他遭受了流放哈萨克斯坦(1929—1936)、颠沛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1937—1938)、莫斯科近郊的萨维洛沃阶段(1938—1945)、任教于萨兰斯克的莫尔多瓦师范学院^[3](1936—1937、1945—1969)等一系列事件。直到50年代后期,他才在苏联被首次发掘出来。于是,才有了巴赫金的手稿《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1960)的发表、《陀思妥耶夫

[1] 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张杰、万海松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66页。

[2] 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第66—67页。

[3] 该校自1957年起改为莫尔多瓦大学。

斯基创作问题》的修订和再版(1963)^[1]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问世(1965)。可以说,正是这第一次被发现,使得巴赫金终于有机会从历史的尘封中走出来,并进而跨出国门、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它为巴赫金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被发现”^[2]奠定了基础。历史最终给了巴赫金以巨大的声誉,但是,对巴赫金来说,荣誉和名声来得太晚了。1975年3月7日,这位学术巨人走完了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坎坷一生。

巴赫金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下,一直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到压制排斥。但他仍热情地追求真理,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创作出大量卓尔不群的哲学和文艺理论著作,真正体现出了他所倡导的“独立人格”精神。而恰恰是这一点,造就了今天为世人所敬仰的巴赫金。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和研究道路,可以说,是一种十分神奇而又值得思索的文化现象。所以,正如法国著名批评家托多罗夫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具有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的确,他的

[1] 该书再版时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2] 巴赫金的第二次被发现是指:20世纪60年代,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这两本书的出版,引起了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注意。他们把巴赫金的论著译成法文,介绍到法国,使巴赫金在西方名声大振。从而引起巴赫金学研究的出现。巴赫金的第三次被发现是指:继60、70年代巴赫金的著作不断被介绍到西方之后,80年代,巴赫金的著作不断被整理出来,标志是1986年,俄罗斯学者鲍恰罗夫和柯日诺夫合编的巴赫金的《文学批评文集》的出版和1984年美国学者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出版。自此,巴赫金思想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巴赫金研究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1]

语言哲学是巴赫金众多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他站在哲学的高度考察语言,并以其独特的人文科学认识和超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论证了语言中的三个因素——人的各自独立,自有价值以及在对话中相互依存的存在形式,确立了对话主义的哲学基础。他所倡导的这种对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渗入多种学科,深刻影响着 20 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

就语言哲学而言,长期以来,世界学界的眼光始终集中在西方,就连俄国本土的学者大多也视语言哲学为西方的专利。因此国际上介绍和研究俄国语言哲学、尤其是苏联时期语言哲学的专著十分罕见,迄今所能见到的只有别兹列普京(Н. И. Безлепкии)所写的一本着重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语言哲学发展概况的小册子。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不仅证明了苏联时期语言哲学的存在,而且也是俄罗斯语言哲学乃至世界语言哲学研究的需要。此外,它更是全面把握巴赫金哲学思想的关键。可见,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由于一般认为,“复调”、“交往美学”和“狂欢化”构成了巴赫金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所以,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上述三个方面,并且主要以文艺学、美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而对其语言哲学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迄今为止,我们能够见到的关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论述仅仅是一些零星或附带的散论。

因此,就目前国内外巴赫金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研究巴赫

[1]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73 页。

金的各种著作已是星罗棋布、难以数计,但正如俄罗斯著名巴赫金学专家、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 E. B. 沃柯娃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研究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文献仍是寥若晨星,而且,它们往往缺乏系统化和概括性,没有对巴赫金思想与其前人和当代学者的一些思想进行比较分析。”^[1]

当然,关注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我们必须看到,它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学术和政治背景的。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正发生着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最终导致了把哲学问题变为语言问题,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 20 世纪初产生的索绪尔语言哲学的关注。巴赫金在其著名的语言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对索绪尔的批判无疑秉承了这股风气。

同时,巴赫金语言哲学产生之初,正是俄国社会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十月革命后不久的时期。那时,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从 1922 年列宁发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开始成为苏联语言学的哲学基础。随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语言文化建设运动。正是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出版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著作,其中包括 1929 年巴赫金以沃洛希洛夫的名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该书从 60 年代起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流传于东西方许多国家。对此,俄国著名学者弗·阿·兹维根采夫(В. А. Звегинцев)总结道:“在苏联语言学历史中,在创造性研究的观点、语言科学研究的课题、任务

[1] 参见本书《序》。